

王正敏院士“造假门”复查结果公布

复旦：是学术不规范，不是造假

本报记者 陈竹

自从被曾经的学生和秘书王宇澄举报，79岁的中科院院士王正敏便被卷入了“造假门”。2013年下半年，这起事件因媒体报道而进入公众视野，恰逢院士制度改革成为话题，王正敏事件是否会成为院士改革的契机，一时引起热议。

近日，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公布对此事的最新调查结果。这份调查结果称：王正敏的专著和院士申请材料中的确存在学术不规范问题，但不能判断为造假。目前，调查结论已上报给教育部、中国科学院。

此前，中国科学院在1月7日首次对外回应时称：已有专门工作小组进行核查，并将严格按照有关程序处理此事。但截至记者发稿时，中国科学院尚未公布调查结论。

瑞士导师回应：给予王正敏“坚定的支持”

2007年，王宇澄便开始在“新语丝”网站举报王正敏学术造假。2012年2月，他向复旦大学发出举报信，2013年8月，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发布了第一份调查报告。随后，由于两人均有异议，2013年9月，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启动复查程序。

在前期调查完成后，对于王正敏的苏黎世大学博士学位真实性等争议基本消失。质疑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方面：其《耳显微外科》等三部专著中，使用的100多幅耳部手术手绘图与其导师、苏黎世大学教授乌果·费绪专著中的图片雷同；将专著中的大部分内容拆分为14篇文章，在自己主编的《中国眼耳鼻喉科》杂志上发表；将43篇非研究性文章当作正式研究论文，放入院士申报材料的附件论著目录中。

对于引用乌果·费绪手术图的做法，复旦大学的第一次调查报告称，1989年《耳显微外科》一书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颁布（1990年）之前出版，必须考虑当时的历史情况；而王正敏主编的《颅底外科学》（1995年出版）和王正敏著的《耳显微外科学》（2004年出版）中的相关行为，不符合国际公认的学术规范，但不属于学术剽窃。

对此，王正敏解释，他的引用得到了费绪本人同意，因此不违反著作权法的规定。“出版社认为文字里有注明，图上就不要再注明了。”王正敏称。

2004年出版的《耳显微外科学》的英文序言正是由费绪所作，而在邀请费绪为

其作序时，王正敏也曾委托时任秘书王宇澄将书稿清样寄给费绪。但王宇澄却对此予以否认，并称：自己在2011年7月前往苏黎世拜访费绪本人，将王正敏剽窃其手术图的做法告知对方，令对方非常生气。

中国青年报记者近日从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了解到，费绪近期在给王正敏的信中明确表态：“你被允许过用你的方式使用我的插图”，并表示，他将在复旦大学和中科院的调查中给予王正敏“坚定的支持”。

记者曾向费绪发邮件求证，但未收到回应。据医院知情人士透露，费绪曾表示，不会回复中国媒体的问询邮件，因为“不愿意被卷进来，而这正是王宇澄试图在做的”。

复查结论维持原判，但院士推荐人仍持疑义

对于将专著内容拆分为14篇文章的做法，复旦大学此次调查结果称不存在违规行为，理由是这14篇文章不是作为论文发表，而是作为教学用途，“写成知识性的介绍或讲座式文章”，以连载方式刊登在该杂志“教育园地”等栏目。

记者看到，在《中国眼耳鼻喉科》杂志2000年第5卷第1期，文章开头配发的“编者按”说明如下：“自本期起，本栏将连续刊载有关耳显微外科的基本知识，内容节选自王正敏教授编著的《耳显微外科》一书，其材料丰富翔实，读后将裨益于耳显微外科的开展。”

此外，对于在院士申报材料中，有四分之一的非研究性文章被当作正式研究论文放入申报材料的行为，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主任周鲁卫说：“我们只能判断为不严谨，应该将论文与非论文区分成两个部分，但不能说他是造假。”

“我的理解就是，要把发表过的文章如实地列出。”王正敏说，“我承认有些不是规范的论文，但科普文章或病例报告也是不拘一格地来表述自己的学术思想、手术方法，很多国外的医学大专家也写这种文章，在美国卫生总署相关的表格中，就可以包括这些内容。我想让评审人知道，我不只关注科研，也关注教学和临床经验总结。”

当初王正敏申报院士的推荐人——中科院院士刘新垣却不认同王正敏的说法，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任何时代，对于学术规范的要求都是一致的，这是公认的准则。”

因此，在复旦学术规范委员会发布第一次调查报告之前，刘新垣曾3次给复旦

大学校长杨玉良写信，要求彻查此事。第一次调查报告出炉后，他对结果仍感不满意，2013年10月，包括刘新垣在内的4名当初推荐王正敏的院士向中科院发出联名信，要求对这起事件再做核实。

另一名推荐人戚正武院士则针对“一稿二投”问题表示，“事后，王正敏将上述不知情的论文又作为竞选院士的材料申报，这就不是在调查结论上所说的‘不实事求是’那么简单，至少是弄虚作假。”

但周鲁卫表示，现有调查结论在没有新的材料出现前不会改变，此次学术委员会复查只是对原有调查的补充。

争端背后的师徒恩怨

在王宇澄连续5年的举报中，将矛头一直指向论文、专著、学位等问题。“他那么恨我，出乎我意料。”在1月3日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举行的情况通报会上，王正敏如此表示。他认为，王宇澄开始与自己有矛盾，是从2006年他不再让其担任秘书开始的。

随后，一份《我的爱徒王宇澄培养计

划》文件，使得院士“造假门”中的师徒恩怨逐渐为人知晓。

王正敏称，该文件是王宇澄于2009年起草的，其中包含让他作为终身荣誉秘书、学科带头人等数项“荒唐的请求”，希望王正敏能够签字同意，但王正敏拒绝了。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院长孙兴怀告诉记者，从2009年开始，王宇澄便开始在医院内部举报，并在公开场合播放带有举报王正敏内容的PPT，散发传单，且无故不出诊。根据医院的出诊记录，王宇澄2012年普通门诊工作量仅136人次，2013年全年普通门诊工作量仅7人次。两年的普通门诊数为143人次，相当于一个普通医生两天的工作量。

但王宇澄本人对此矢口否认。他说，自己一年的门诊数量至少有1万多人次，那一份计划书也并非他人所写。王宇澄向记者提供了一段录音，其中包括“对方投资两亿元，你是负责人”等内容，他称，这是王正敏曾经对他作出的承诺——让他负责人工耳蜗项目，是对不再让他担任秘书的补偿——但王正敏最后却食言了。



1月3日，王正敏在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举行的情况通报会上。

本报记者 周凯摄

复旦调查结果否认“山寨”国外产品和套取国家经费

“人工耳蜗”是不是第二个“汉芯”？

本报记者 陈竹

在学位的真实性和论文、专著的原创性等相继受到质疑后，中科院院士王正敏所领衔的另一研究项目——人工耳蜗也被质疑为“山寨”国外产品，并借机套取国家经费。也有舆论质疑，人工耳蜗是“汉芯”事件重演。

针对质疑，王正敏和曾经参与过人工耳蜗研发的团队成员相继接受调查并回应，称人工耳蜗研发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中仅第一阶段参考了国外产品，而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和上海力声特公司分别申请的项目，均无王正敏参与。

人工耳蜗团队回应“山寨”：仅第一阶段参考国外产品

2014年1月3日中央电视台的报道称，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王正敏领衔的人工耳蜗项目是“克隆”澳大利亚科利尔公司样机的产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研发。

节目播出后，几名采访对象相继声明节目内容不实，称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录，并断章取义完成的。

1月9日，人工耳蜗研发团队的主要成员陆续接受调查。体外机的主要研发者周耀华表示：“凭什么说我们的产品是山寨的？”

已从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退休的技师范宝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人工耳蜗主要分为体内机和体外机两个部分，其中，体外机即语音处理器，当时主要由复旦大学微电子系教授周耀华等人完成；体内机即集成电路解码刺激器芯片，则主要由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卫生部听觉医学重点实验室的范宝华（主任为王正敏——记者注）、上海贝岭微电子有限公司芯片工程师吉为民等5人的核心团队负责。

范宝华回忆，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人工耳蜗的研发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与不同的生产单位合作。其中，前两个阶段均以失败告终，第三个阶段才研发出可以临床应用的产品，并在2010年获得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而在三个阶段中，只有第一阶段参考了国外的人工耳蜗。

上世纪90年代初，王正敏团队研发第一阶段的委托加工单位是上海市半导体研

究所（此单位目前已被撤销——记者注），当时，由于技术落后，经过3年的努力，产品研发失败了。吉为民说，参考澳大利亚的产品就是在这个时期；当时，澳大利亚科利尔公司向王正敏赠送了两个人工耳蜗，分别植入了武汉的一对兄妹体内。同时，科利尔公司还给王正敏提供了一个人工耳蜗，作为中澳合作人工耳蜗学习班的教学工具。

这个作为教学工具的人工耳蜗被上海市半导体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打开，“由于程序是上电保护的，打开的人很不专业，所以产生了‘掉电’现象，里面的程序都消失了。”据吉为民说，参考的主要是体外机部分。“可以看到里面是一块铝制的集成电路，不是通用的，而是一块专用的数模混合电路，有电容、线圈、六七个二极管。再把这个电路和专业文献对照，对我们布局的思路和见解有启发。”

但他解释说，这块芯片与现在的芯片卡的原理类似，使用的是射频技术，必须依靠外部设备才能传输出信号。“当时，我们还没有现在的‘读卡器’，因此，有这个芯片也读不出来。”吉为民说。

王正敏自己的说法则是，工程师告诉他，“看到的是一个几何图形，并不能明确地看到线路图。但几何图形多少有一些启发。”

吉为民说，研发的第二阶段为1995~1998年，委托的是另一家涉密军工单位进行加工。第二阶段的研发也采用了铝栅工艺，花费不到5万元，仅用一年就做出了样品。由于无法使用人工耳蜗在高电压下工作，这一阶段的科研最后还是失败了，但其阶段性成果在1997年获得实用新型发明专利。

这是人工耳蜗项目获得的第一个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资料显示，该专利名称为“多道程人工耳蜗”，于1996年4月申请，1997年8月被授予专利权，设计人为王正敏、范宝华、李留英和钱学俊4人。吉为民解释说，实用新型专利与发明专利不同，不是提出新的技术方案，而是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

人工耳蜗产品正式研发成功，是在第三阶段，即1999~2003年。1999年，研发团队开始与上海贝岭微电子有限公司等单位合作，放弃了当年的澳大利亚产品所用的铝栅工艺，改用硅栅工艺。

在这一阶段，周耀华开始负责体外机部分的研发，并在运用DSP（数字信号处理器）进行语音处理上取得了突破，最终在2003年研发成功。范宝华表示，研究成功，由于不希望中国生产出人工耳蜗，科利尔公司曾提出购买专利，但被拒绝。

吉为民表示，中国的集成电路到现在仍与国外有10年以上的差距，国内的人工耳蜗技术也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但和国外的产品在软件编程、硬件设计上存在根本性的不同。由于国外公司的研发投入高，使用的是高成本的专用电路，体积小，因此是“耳背式”，可以直接挂在人耳上；而他们设计的第一代国产人工耳蜗产品则大部分使用通用电路，因此还是“体式式”，需要挂在身上。

但几名受访者均表示，虽然国产人工耳蜗产品与国外技术有差距，但它的出现压低了国外产品的价格，这也是当初研发成功时，科利尔公司希望购买专利的原因。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耳鼻喉科教授李华伟说，目前，国外人工耳蜗产品仍然占据中国市场95%的份额，新一代产品售价基本在20万~30万元左右，而国产人工耳蜗价格则是5万~8万元。不过，在国产人工耳蜗出现后，老一代的进口产品便开始打折销售，目前已经降到11万~12万元。

在央视报道中，范宝华的一句话“65%用他（国外）的技术，35%用自己的”，被作为其剽窃国外产品的证据。

对此，范宝华解释说，采访中这句话并非针对人工耳蜗。“我的原意是，国家专利法规定，实用新型专利必须25%是国内自主技术，我跟大家说，我们申请专利，至少要做到35%是自己的，65%是国外的，最后申请的时候100%都是自己的。”

王正敏回应“4000万项目”：与我无关

央视报道还称，王正敏研发团队和上海力声特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以各种名义向有关部门申报项目，其中，“国产人工耳蜗及临床技术研究项目”获得国家卫生部专项科研经费2171万元；“上海力声特人工耳蜗建设项目”获得国家工信部经费2138万元。

王正敏则回应说，自己同这两个项目

都没有关系，也没有从中获得过利益。“把这部分经费跟我联系起来，毫无事实根据。”

从1996年到现在，王正敏的研发团队共申请了5个发明专利，6个实用新型专利，1个外观设计专利。其中，除了1997年的实用新型专利，其余都是第三阶段的研发成果。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资料，这11项专利的申请人均为王正敏等人，专利权属于上海力声特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王正敏说，2004年研发成功后，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便将人工耳蜗成果转化给了上海力声特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不久前，力声特的控股公司——海南海药董事长刘悉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2004年，他花300万元买下了王正敏团队研制的人工耳蜗专利权，并投资设立力声特公司，在王正敏的样机基础上进行研发。此后，直到2008年产品基本成型，王正敏均未再参与过。

2005年，由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控制的上海汾阳视听医学技术有限公司对力声特增资300万元，占股达到18.52%。但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汾阳视听医学技术有限公司在力声特公司所占的股份因公司增资已经被逐渐摊薄。刘悉承亦表示，海南海药于2011年增持力声特后，复旦在力声特公司占股比例很低，目前不到1%。

1月7日晚，海南海药发布澄清公告，称力声特公司目前共承担两项国家项目和5项市级课题，国家项目共获得经费1990万元，用于第二代人工耳蜗的研发与改进、浦东人工耳蜗建设项目的技术改造；市级课题共获得经费275万元，用于REZ-1人工耳蜗扩大适应症临床验证、建设国产人工耳蜗持续研究、开发、转化基地及衍生产品开发等。

力声特公司一名主要负责该项目的管理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个国家项目属于工信部的技术改造项目，主要经费用于公开招标的设备和浦东厂房的建设，从2012年到2014年已经完成技术改造，项目是力声特公司申请的，没有王正敏的名字。

而另一个2000万元的项目——“国产人工耳蜗优化及临床技术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则是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教授戴

他还表示，在王正敏成功申报院士后，便让自己马上销毁当时留存在医院的院士申报材料，“过了几天，还派别人来打探我是否销毁。”他说，目前手中的材料，都是当时保存的电子版。

但据医院知情人士回忆，在申报院士时按规定，增选申报材料在医院公示栏内公示了至少一个月，不存在保密和销毁的需要。

在一波又一波的舆论冲击中，由于双方都鲜有提供与“学术造假”核心事实相关的证据，对事件的争论开始陷入“罗生门”状态：如王宇澄称，在院士评选后，王正敏曾让他赶紧销毁评选材料；又有当年申报院士的推荐人对媒体称，当时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暗示，要对王正敏“多加关照”……

但在许多细节上，由于双方说法完全矛盾，且缺乏其他证据，难以考证。

关于王正敏涉嫌专著、论文、院士申报材料造假，和人工耳蜗“山寨”国外技术等一系列问题的调查结论，还有待中国科学院做出最终的回答。

中国学生有望去澳洲读初中

本报北京1月24日电（记者原春琳）澳大利亚驻上海总领事馆教育领事徐佩仪今天在北京透露，今年上半年，中国学生可能有机会去澳大利亚就读中学七年级以上的课程。换句话说，中国学生有可能去澳大利亚接受初中教育，而以往，中国学生要去澳大利亚留学，最低的年级限制是高中。

徐佩仪是在今天举行的澳大利亚参第十九届中国国际教育2014春季巡展的通气会上透露此消息的。

这个改变源于2013年11月澳大利亚新任移民和边境保护部长斯科特·莫瑞森（Scott Morrison）及教育部长克里斯托弗·贝恩（Christopher Pyne）宣布的一系列措施。徐佩仪介绍，这一系列措施通过简化审理级别框架（Assessment Level Framework）以及向省授予学位的非大学院校实施简化签证审理程序，从而达到简化学生签证的目的。

具体来说，审理级别框架下的审理级别，将从现在的5个级别减为3个。徐佩仪解释，对于审理级别为三级的学生申请人，如果资金担保由学生申请人的近亲提供，那么资金证明材料将从满足前18个月的费用缩减至满足前12个月的费用。这意味着，学生在申请签证时需由银行出具证明的担保金最多可减4万澳元。

徐佩仪说，根据澳大利亚的立法体系，法规必须经澳大利亚总督批准。这些信息应被解读为一揽子建议方案，最终须由总督定夺。一旦通过，新政策在2014年上半年就可以实施。

澳大利亚一直以来是最受中国留学生欢迎的留学目的地之一。最新统计显示，2012~2013财政年度（即2012年7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澳大利亚移民和边境保护部（DIBP）共收到来自澳大利亚境外的中国学生签证申请2.9万余份，比2011~2012财政年度同比增长22.2%；同时，DIBP在此期间共核准签发了2.7万多份境外中国学生签证，比2011~2012财政年度增长17.4%。

内蒙古海勃湾区力促教育均衡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刘岗）“这个学期园里又增加了14名教师及保育员，并采取‘以老带新’、‘师徒结对’等方式提高青年教师的基本素质，我们还将举行‘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等活动，为教师提供锻炼、展示自己的机会。”说起内蒙古海勃湾区第三幼儿园的新变化，副园长王金兰非常高兴。2013年，该园园址面积增加了3200多平方米，增添了新设施，整个面貌焕然一新。

近年来，内蒙古海勃湾区依托培训基地，借助合作交流，不断加强教育标准化学校建设及对薄弱学校的改造，力促教育均衡发展。2013年，该区投资11937万元用于学校校园及风雨操场的续建工程，并投资2150万元，推进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建设。截至目前，红草堡幼儿园和三幼已经投入使用。已建成、维修及在建的风雨操场共11个，覆盖率达到60%，塑胶跑道基本实现了中小学全覆盖。

2014年，海勃湾区将开工建设二中万达分校、一幼万达分园及海北新城小学，力争依林小学、新天地幼儿园投入使用；新建九中、一小、团结小学3所学校的风雨操场，继续加快完成和平街学校、光明路小学风雨操场建设；深化名校建设工程，互派教师学习交流 and 教学指导、观摩、听课，并加大教师招聘和培训力度，优化教师队伍，切实推进教育均衡发展。

LUPA大学生高端就业实践峰会启动

本报讯（刘丽）在美国棱镜门事件爆发之后，要求中国开发自己的国产操作系统，以保障国家信息安全呼声越来越高。然而，想要开发自己的操作系统，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作为依托。近日，LUPA人才芯片工程大学生高端就业实践峰会—北京站隆重启动，数十名信息化核心技术领域专家与企业领导围绕这一问题，为解决高新技术大学生的准就业、按需就业难题抛出了橄榄枝。据介绍，本次会议是由LUPA人才芯片工程和国产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产业联盟主办，旨在探讨未来人才培养和开源技术在校的推广和应用，努力促进世界各国青年开源技术的合作对话。

上海力声特公司回应称，个别患者的使用效果不理想，国内外人工耳蜗产品均有此类现象发生，患者自身差异（听力障碍的时间长短和程度）、患者耐受性、手术过程、术后调机均可能对耳蜗的使用效果产生影响。但截至目前，公司与植入耳蜗的患者之间并未因为产品质量问题产生法律纠纷。